

主编 徐真华

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丛书

ON THE WAY TO POST-PHILOSOPHY OF
LANGUAGE
后语言哲学之路

钱冠连 著

广东省“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

主编 徐真华

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丛书

后语言哲学之路

ON THE WAY TO POST-PHILOSOPHY OF LANGUAGE

「既然『东方不亮西方亮』是自然的，『西方不亮东方亮』也是自然的，『后语言哲学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出的。』」

钱冠连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语言哲学之路/钱冠连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4
(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446-3875-3

I. ①后… II. ①钱… III. ①语言哲学-文集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8447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周岐灵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8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6-3875-3 / B · 0031

定 价: 2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主编：徐真华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初明	韦立新	平 洪	刘 岩
刘建达	杨 可	李敬平	余 东
陈开举	陈多友	林秀梅	郑 超
郑立华	章宜华	董燕萍	曾用强
戴桂玉			

总序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是与国运衰微、西学东渐、现代大学勃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东西方文明在古老中国不断冲突、碰撞、磨合以及融汇,其剧烈之程度在中国对外交往史中前所未见。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东方老大帝国的羸弱暴露无遗。清政府内洋务派为了挽救清廷的统治危机,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洋务,创设近代企业,将发展重点放在“器物”层面,“师夷长技以制夷”。1894 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引起思想文化教育界强烈震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受到空前挑战,“制度”革新摆上核心日程,变法维新运动持续高涨。

此时,时代需要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翻译者”,从一开始,外语就承担了读懂历史变迁、推动民族奋起自强的重任。中国一批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魏源、郑观应等,为译介西书和传播西方的政治体制、科学知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862 年,被誉为近代第一所国立外国语学院京师同文馆应运而生,恭亲王奕訢等人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上阐明了建馆的意图:“欲悉各国情景,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作为清代最早培养译员的洋务学堂和从事翻译出版的机构,同文馆为推动中国近代化作出了积极而重要的尝试。此后,得益于外语的译介作用,西学在中国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曾负笈海外的严复翻译了一批重要的西方著作,他的译著(如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尤其是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救亡图存的观点)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戊戌变法之年,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创立伊始,即开设英、法、德、俄、日 5 个语种的课程。1902 年,京师大学堂复学,且随即合并了京师同文馆,次年更名为译学馆。随着现代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兴起,外语专业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我国建立并逐步发展。揭橥“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外语学科增添了发展动力和活力。

适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促进中国近代化为宗旨的海外留学热潮激情涌动。1872年到1875年间，由近代中国留美第一人容闳提议，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这些留美幼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此后，旨在寻求真知的官派和自费留学逐波激荡。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分布在政界、军界、实业界、教育文化界等各个领域，不少人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及至民国时期，一批既饱览西学又具有深厚国学根底的“海归”执掌大学外文系或者从事外文教学研究工作。作为“睁眼看世界”的文化精英，他们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理念、模式和方法，制订学术范式，建立课程体系，名师俊彦辈出，学术声誉远播。从当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高校外文系的一流学术阵容可见一斑。在外文界，前辈不懈开拓进取，后学奋力继承创新，学术薪火相传，在短短数十年内为外语学科奠定了较为厚实的基础。1949年以后，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嬗变，外语学科的持续发展受到很大干扰和破坏。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长期以来对外封闭的坚冰开始消融，外语学科又受到重视，得以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近30多年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思潮与思想观念更趋丰富多元，学科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这些变化既拓展了外国语言文学的外延，又深化了其内涵。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依存明显增强，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涉及经济、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各个领域，为外国语言文学创设了新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在这个进程中，我国外语界就全球化背景下外国语言文学的使命和责任、外语教育规划、外语学科发展路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面临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增进国际理解的艰巨任务。哲学社会科学要繁荣发展，既要“请进来”，也要“走出去”，对本国传统文化精髓，既不狂傲自大，也不妄自菲薄；对外国优秀文明成果，既不全盘照搬，也不一概否定。在纵横捭阖的大时代面前，我国学术发展更需要世界眼光、国际视野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广阔胸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外语院校和外语系学科有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优势，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推进内涵发展、质量提升、品牌建设，服务于整个国家学术的发展，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能力的大幅提升。

国学大师、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读书必先识字”,他自己就精通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还修习过中亚古文字和蒙古语。时至今天,要了解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文明的历史,要感受罗马帝国的辉煌和文艺复兴的灿烂,要领略工业革命和西方哲学的魅力,要把握当前国际社会发展的律动和人类进步的脉搏,外国语言文学仍然是一种十分重要而必不可少的工具、载体和媒介。在全球化背景下,普世价值往往能更易超越民族、文化、宗教、地域认知等,通过外语这座桥梁得以交流和沟通、发扬和传播,从而提升人类社会的福祉。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为适应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需要,外语院校和外语学科一项很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就是要践行“立足平凡、追求卓越”的教育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着眼于培养全球化、高素质公民。这种人才,具有较高的公民素养,“不能仅仅是语言、翻译方面的专家,更要在此基础上成为对象国研究和区域研究的专家,成为外语精湛、专业突出、高素质的复合型、复语型的国际化人才”(教育部副部长郝平)。简而言之,全球化、高素质公民的内涵可以用“中国灵魂、世界胸怀、现代意识”十二个字来表述,它包含了人与自我、人与国家、人与世界三个命题。第一,大学生要追求自我完善,务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自持,赋予个体生命实际意义。第二,大学生要理性爱国,正确理解与认同传统文化,自觉参与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进程。第三,大学生要用全人类而非单一国家民族的眼光关注诸如气候变化、核扩散、大规模传染病等国际性难题,不断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对外具有独立的品格和开放的心态。

在全球化语境下,外国语言文学需要遵循学科发展规律,顺应国家政策安排,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逐步提升学科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推进外国语言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密切追踪国外学术前沿,注意学习和借鉴,但不能满足于“跟随”和“阐释”,要力争取得有突破性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原创性外文理论成果。充分发挥外语学科优势,整合相关学科资源,开展全球问题、国际区域和国别问题的长期跟踪研究,为国家外交战略服务。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和地方战略需求,就外语教育教学和对外交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鼓励个人自由探索,支持学科集体攻关,为党和政府提供高水平的决策咨询服务。比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广东省政府的鼎力支持下组建的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近年来就国际金融危机、中国—东盟自贸区成立、日本地震海啸等重大问题对广东的影响及对策,组织外语专

家和相关学科学者进行专题研究,向有关方面提交了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对政府施政和企业决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走出去”,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环节。外语院校和外语学科可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健全高端国际型人才培养体系,重点培育一批高水平、专业化的翻译团队,培养造就一批造诣高深的翻译名家,翻译并向海外推介一批中国文化经典和学术精品。要适应学科分化与综合的趋势,加强外语与经济、管理、法律、文化、军事、信息技术等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在保持传统语言文学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努力催生出一批能与国际学术界直接对话、具备学术话语权的新型特色交叉学科。加强与港澳台外语界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和学术组织,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学术组织有关政策、规则、标准的研究和制定。

以“工程”、“项目”和“课题”等名义对高等学校发展实行管理和调控,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重要特色。目前,少数外语院校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高校行列,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也拥有一批国家级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国家精品课程、国家教学名师等,这些总体上构成了外语学科领域的学术制高点。2008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入选广东省“211工程”第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其系列专著凝聚了“语言·文学·文化”、现代技术与语言教学评估、跨文化交际与管理、翻译研究与实践等研究方向,来自政府的支持为广外外语学科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平台。出版“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丛书”,一来可作项目成果的初步展示,二来以此就教于同行专家学者。

慢工出细活,厚积才能薄发。全球化背景下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事业一样,依然任重而道远。

是为序。

徐真华^①

2011年6月

^① 徐真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史馆文学院名誉院长。

西方哲学的语言性转向,滥觞于 20 世纪之初,兴旺 70 年左右,影响至今,但“形而上学已经恢复了它的中心地位”(苏珊·哈克 2004^①)。既然“东方不亮西方亮”是自然的,“西方不亮东方亮”(王寅 2008^②)自然也是自然的:后语言哲学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出。

(中国)后语言哲学的四原则是:(1)吸取西语哲(分析传统和欧洲传统)的营养;(2)从日常社会生活中挖掘出新的语言哲学问题(所谓“节外生新枝”);(3)它的研究方法,主要表现为从词语分析(形而下)找入口,从世界与人的道理(形而上)找出口(乐意接受其他方法与风格);(4)重视汉语语境,实现西语哲本土化。

① 苏珊·哈克.2004.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总序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② 此为王寅先生于 2008 年 1 月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年会暨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主题发言中的一句话,后于 2012 年在《中国后语哲与体验人本观——十一论语言学研究新增长点》一文中再次引述此句(《外语学刊 2012 年第 4 期》)。这句话恰当地比喻了后语言哲学在中国诞生的必然性,含义深远。

致 谢

在我的脑海中,保存着一本我的提携人名录。有着重大影响的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是其中一个。这是我一生的温暖源头之一。三十多年前吧,我还在湖北恩施师专教书,邢先生是湖北语言学学会的会长,我向他提出参加学会之事,他回答干脆:“发表你论文的杂志档次高,我同意。”2004年,他主编的《汉语学报》(2004 第二期)把拙文“以学派意识看汉语研究”放在篇首位置发表,遂有后来的一连串反响:最重要的是2005年《中国学术年鉴·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大篇幅转载该文,且《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邢福义2005:305-323)中的评价为:“该文发表后,产生较大反响。《光明日报》连续发表语言学者的文章,认为此文的论说‘很值得重视’,‘学派不盛不仅是语言学界的现实,也是整个中国学术界的现实’。”窃以为,一篇论文被教育部蓝皮书(即《发展报告》)如此引用,多多少少透露出执笔者的深意:希望该文会对学科的发展有所影响吧。2013年,我收到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编辑孔先生来信,邀请我为由邢福义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中国语学文库》赐稿,这也可以解读为,总主编对我抱着一点希望啊。后来虽然在彼出书不成,那是事出有因。但是,一旦我邀请他赐我一短序,他几乎二话不说,第三天就电邮给我了。在此基础上,他将此文再加修改与丰富,立即寄给了《光明日报》“国学”专栏(2014年5月6日,16版),前后不到10天就见报了。感谢他对语言哲学发展的关心以及对我本人的又一次提携。他的眼光,还有超越亲疏的大文人精神与胸怀,为众多的狂躁中的知识分子做出了榜样。

对我一生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徐真华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前书记兼校长,现在为博士生导师),他又一次出手帮助。在了解到我不得不寻找新的出版社时,他几乎没有什么考虑,就决定将拙著纳入他领导的出书工程之中。

我的老友王寅先生,对后语言哲学活动的态度鲜明的支持与加入,使

事实上存在着的中国后语言哲学的溪流,形成了公开的潮流与趋势。其作用之大,不言而喻。这次他写序,又一次推动潮流的有力之举。

老友郑延国教授(翻译理论家、书法家)读过《钱冠连语言学自选集——理论与方法》之后认为,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研究西方语言哲学,以达到“走出我们自己的语言哲学之路来”的效应,有必要另成一书,可冠名《语言哲学论》。他曾三度写信给我,多次电话问及,这种事在学术界少见。为朋友出书,墨催远问,诚督恳促之状,只有我这个当事的朋友才能感知,外人怎么也不会相信的。须知,即使论文集出世,也不会引述他一文一字。这种既不沾功也不带利的纯友谊,如今有几多啊?

学生王爱华,这部书的通篇整理由她独力完成。四年多来,一字一符,都渗透了她的心血。我已经将她的名字以编辑的身份写上了封面,她坚决地谢辞,但我仍然觉得自己对不起她。

广外发展规划处的余泽浩先生,在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接洽的过程中,一切为我着想,认真、耐心地为我做好沟通工作。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以超常的程序与效率处理拙著。责任编辑周岐灵女士,笃守职责,善于沟通,一切为读者着想。

对以上各位先生,我由衷地感谢。

2014年5月31日

序言

打开钱冠连先生用电子邮件传来的《后语言哲学之路》原稿，封面上两行文字扑入了眼帘：既然“东方不亮西方亮”是自然的，“西方不亮东方亮”自然也是自然的：后语言哲学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出。

这两行文字，用的是散文表达方式，凸显的却是普世性的哲学原理。我无比振奋。首先，“既然‘东方不亮西方亮’是自然的，‘西方不亮东方亮’自然也是自然的。”这朴实的话语，让我立即想起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句“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并且立即演化成为“青山绿水无偏见，红日何曾忘四方”。其次，“后语言哲学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出”这样豪壮的话语，让我仿佛看见，有一位中国汉子，站到了高山之巅，发出了信心十足的呼喊。

并非每个学者都能有钱先生这样的襟怀和见识。满清后期以来，外强入侵，国弱受欺，面对洋人，国人往往自卑自贬。这在《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可以看到十分形象的描写。这种状况，影响我们几代人，在学术研究上也是如此。说一件小事。1981年6月，语法学术讨论会在密云举行，这是第一届中年语法学者的学术讨论会，特邀吕叔湘、朱德熙二位先生出席了会议。在“密云会议”上，在讨论到句子类别问题时，我谈及高名凯在《语法理论》中曾提出“句类”、“句型”、“句模”的三角度分类，话刚出口，一位与会朋友立即打断，说：“那是高先生自己提的！”接着，他转谈别的问题，我再也没法开口。这件事，三十多年来一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无论什么学说，都是某一个人自己先提出来的，为什么外国某人“自己”提出来的就是理论，高先生“自己”提出来的就根本不屑一提？就因为高先生是中国人？这种心理自卑，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民族自卑，对于我们的学科建设，对于我们的学术发展，妨害极大。

最初的(中国)后语言哲学思路，是钱先生在2007年《西语哲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一文中提出来的。关于(中国)后语言哲学，冠连先

生总结出了“四原则”：(1)吸取西语哲(分析传统和欧洲传统)的营养；(2)从日常社会生活中挖掘出新的语言哲学问题(所谓“节外生新枝”)；(3)它的研究方法，主要表现为从词语分析(形而下)找入口，从世界与人的道理(形而上)找出口(乐意接受其他方法与风格)；(4)重视汉语语境，实现西语哲本土化。在本书的导论部分，钱先生写道：“允许有西方的分析传统、欧陆阐释传统，也应该允许(中国)后语言哲学(四原则)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国学者做语言哲学的方式与风格各有千秋，却都是花。后语哲四原则单打独斗，就活不了。”我情不自禁地感叹：好一颗中国心！好一份中国志！好一个中国梦！

应该特别指出：关于“中西语言学的学派与流派”，本书中冠连先生有专文论说。他分析道：西方语言学的学派与流派，可圈可点的甚多。中国的汉语研究情况如何？在《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语言文献卷》里，从吴承仕、黄侃、钱玄同、林语堂、罗常培、王力、陆宗达，到周祖谟、朱德熙、裘锡圭，所列论文精彩纷呈，却让人看不到学派与流派的任何提示。不过，他又分析道：吕叔湘对汉语语法研究有很大贡献，对后人具有巨大影响，邢福义就是接受吕叔湘影响最深的学者之一。如果不揣冒昧，也许可以给吕叔湘语法研究这个学派起个名，称之为实据派。至于我国的外语学者，没有自己的学派，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要说有“流”有“派”，恐怕也是跟着西方在“流”，跟着西方在“派”，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反省的勇气。

我个人曾写过一篇《汉语语法研究之走向成熟》的文章，发表在《汉语学习》1995年第1期上面。我认为：走向成熟，意味着尚未成熟。因为，毕竟还在“走”，只是“向”。成熟与不成熟，对于一门科学或一种艺术来说，学派或流派是否形成，应是突出的评判标准。而学科的成熟，学派或流派的形成，需要众多学者一代接一代地作长时期的努力，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水到才能渠成，主观上再着急也没用。后来，我多次就汉语语法研究的学派问题作了若干进一步的解说。窃以为，钱先生提到的吕叔湘语法研究“实据派”，那只不过是一个并未成形的淡淡的影子，表明了他对学派问题的关心，仅此而已。我之所以写出上面这些话，是因为我觉得我跟钱先生心灵相通，都一直在关注着一个相同的命题。不过，他视野更宽，他的论说哲理性更强，这是我所不及的。

《荀子·解蔽》：“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意思是：精通某

一具体事物的人,可以管理这一具体事物;精通各种事物之理的人,可以全面兼顾地管理各种事物。我们的老祖宗,在这里谈的就是哲学问题。语言学,内部包含不同层次的许许多多学科;往外说,又跟许许多多的学科发生关联。仅以语言学内部来讲,谁个能够样样都能精通?然而,我们不能没有哲学意识。多了解点语言哲学,多思考些语言哲学问题,这对个人素质的提高和整个学科档次的上升,都会大有好处的。应该感谢钱先生出版《后语言哲学之路》一书,这部专著为我们学界输送了营养!

邢福义

2014年4月8日凌晨

作序

寂寞书斋不寂人

——序《后语言哲学之路》

一

承蒙钱冠连先生抬爱,请我为他的新著《后语言哲学》作序,但我却认为,这是他再次提供我先睹为快的机会。手捧书稿,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浮想联翩。钱先生虽已年过七旬,依旧笔耕不止,这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执着追求!

“继承创新、与时俱进”,亦已成为当今学术时代的最强音,也表明了我国再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决心。正是在这一口号的引领下,学术界迎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崭新时代。钱先生正坚守了这八字方针,践行着“寂寞书斋不寂人”的人生境界,近年来出版了数本专著和百篇论文,大倡创新之风,专行前沿之事,为语言学界乃至哲学界发挥着指引作用,“节外不断新枝生,竿头更见鲜花开”,为语言学界和哲学界谱写了流芳的华章。

二

读书人皆有如下体会:写一本专著难,写出一本创新性专著更难!钱先生凭借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迎难而上,为我国学术界树立了光辉榜样。他不仅连连出书,而且一出,就是一本沉甸甸的大作!可谓本本见彩,篇篇出新,堪称我国外语界的“理论拓荒者”。他的每本专著都有自己的新理论、新范畴、新命题,且文字流畅,警言妙语俯拾即是,为我国学界不断输送新养分。

他于1988—1992年间尝试将“美学”应用于诠释语言美和言语美这一全新命题,建构了《美学语言学》这一新兴的语言学边缘学科。功夫不负有心人,成果终报拓荒者。该书曾被多家期刊和报刊转载和评论,深受国际名人高度赞扬,在学界引起了重大反响。

他于1997年出版了《汉语文化语用学——人文网络言语学》,基于母语语料的分析提出了语用学中的“三带一”理论,坚持将后现代哲学中的“人本主义”融入到语用学研究之中,开拓性地将语用学定位于“人文网络言语学”,从而开创了中国学者研究语用学的新篇章。

他于2002年出版的《语言全息论》,率先运用“宇宙全息律”、“生物全息律”、“系统论”等创造性地解释语言的全息性质,揭示了各种语言性质的根源以及存在各种语言理论的缘由,提出了“语言与自然大宇宙、人的生物体等全息同构”的命题。

他于2005年正式出版了《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行为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尝试从语言哲学的高度来解释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语言是人类的最后家园,从而为“中国后语言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必须基于人本精神研究语言才可直抵语言之精髓,这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不谋而合,或是有谋而合。

我们知道,在20与21世纪之交时,钱先生开始发表语言哲学系列论文,一路走来,硕果累累,一篇接着一篇的高质量论文问世,一本接着一本的高水平专著面世,吹响了外语界进军语言哲学的冲锋号,将我国外语界的语言学研究推入到一个全新的平台。站在这个平台上再重新审视昔日之语言理论,大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特别是他提出的“从语言入,从哲学出”的研究新思路,为我国外语界学者打开了一个语言和哲学相结合的新窗口,也奠定了中国后语哲的基本研究方向。

这四本专著和百篇论文奠定了钱先生在我国学界的崇高地位,足以彰显他继承创新的探索精神,更表明了他“立足本职、兼达天下”的学者胸怀,确实为世人树立了辉煌风范。

三

说实话,作为一位学者,能做到这个份上,即便罢手,也可心安理得,安

享晚年了。但他依旧锲而不舍，奋发图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又写出了新作《后语言哲学之路》，为建立有我国特色的语言（哲学）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很多学者认为，当今西方语言哲学的高潮时期已过，形而上学死灰复燃，重新占领了哲学的中心地位。在此形势下，我们该怎么办？研究西方理论的学者无非有以下两个选择：

（1）跟着西方学术大潮跑，也将注意力从语言哲学转向“形而上学”，这便是大多数中国学者所惯用之法；

（2）努力将西方理论本土化，使其与中国实际情况紧密结合，当西方语哲之灯不亮时，点亮中国这盏灯。

钱先生没走第一条路，跟着跑，照着说，这也实在是太老套了！他以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再次发扬“创新”精神，毫不犹豫地走上了第二条路，大力开发中国人文科研的方向。他于2007年提出了“西语哲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为我国外语界和哲学界指明了一条崭新之路。

所谓“后”，即英语中的“Post”，该词原意为“田径场上的终点”，而“Post-Philosophy of Language”无非就是以西方上世纪初兴起并发展至60年代后逐步衰落的“语言哲学”为界，重在探索其后的发展新观。再加上“中国”二字后，突出了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西方语言哲学”和“中国后语哲”两者之间，既有连续性和关联性，也有差别性和批判性，更有发展性和超越性，还可能是后来者居上。当学科发展到这个程度，此时的“后（Post）”就有了“反”之义，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反、批”，更主要含“辩证性反”之义。因此，“中国后语哲”更强调国外理论本土化，这一直是我们所钟情的研究之路。正体现出荀子的“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一千古至理名言之精髓。

笔者曾征得钱先生和哲学界朋友的同意，提出了西方哲学的“第四转向”，即“后现代转向”，这正好与钱先生的“中国后语哲”思路完全合拍。正是在此大好形势下，我国外语界的语言哲学研究已从“单兵训练”进入到“集团军行动”，将“个人爱好、随手阅读”纳入到“有计划、有组织”的正常轨道，从“闭门读书，参悟修行”迈入到“交流相长，互补长短”的新时期。一句话，经过钱先生及其同仁数十年的努力，我国外语界的语言哲学研究已